

我国英语教学中的语音体系问题

四川大学 张凤桐

提要:本文以回顾 A. C. Gimson 为代表的英国英语普通型标准发音 (general RP) 的发展进程和近二十年中国英语语音学界的主要科研成果为线索,综合评述 20 世纪我国英语教学中的语音体系问题。作者认为,实现从 Jones 体系向 Gimson 体系的转轨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希望教育主管部门及时会同有关专家学者讨论决定。

关键词:英语教学、英语语音

语音教学是我国英语教学的起点和基础。在有声信息交流地位急剧上升和国际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的今天,尤其让人感到语音教学的重要。我们应当注意选择那种既能通行于大多数英语国家,又有权威性分析与描述的发音模式作为教学标准。这种标准还应跟随自然语言发音的发展及时修正,其标准不应过时,也不应特别时髦。

但就我国英语语音教学整体来讲,采纳的基本上仍是 Daniel Jones (1881—1967) 那种流行于 19 世纪末年的发音标准,并且使用着一些与 Jones 理论相背离或自相矛盾的语音教学体系,使广大师生感到无所适从。笔者拟根据多年收集的文献资料和中外英语语音学界的科研成果,对我国英语语音教学体系的更新、规范、统一等问题,作一个较系统的探讨。

一、我国英语标准发音 (RP) 教学

由来已久

根据李良佑、张日升和刘犁所著《中国英语教学史》(1988) 记载,我国英语教学正式开始于 1862 年清政府开办的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该校设置的第一个专业便是英语。1903 年清政府颁布《奏定高等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8 年第 4 期(总第 116 期)

学堂章程》和《奏定大学堂章程》,明文规定“英语必习,兼习俄法德日之一”。章程正式提出大学设置外国文学专业。英国文学门中的声学大概就是我们英语语音教学的源头了。

现代英语标准发音体系自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都产生了一名具有国际影响的理论权威,我们不妨以他们的名字称呼之:

Henry Sweet 时期 1877—1917

Daniel Jones 时期 1917—1967

A. C. Gimson 时期 1967 至今

Sweet 是现代英语音位理论与音位体系的奠基人。他的理论对清末民初英语教学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难以详细查考。而 Jones 音位体系统治中国英语语音教学达 80 年之久。他是国际公认的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语音学家。他 1909、1917 和 1918 年分别出版的 *The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英语语音》), *An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 (《英语发音词典》) 简称 EPD 和 *An Outline of English Phonetics* (《英语语音学纲要》),为英国人和外国人学习英国英语标准发音 (Received Pronunciation, 简称 RP) 提

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和范例。该书第一版 4 年后即被引进中国,每个词条后都加注了释义,称作《英华正音词典》(*An English - Chinese Phonetic Dictionary*),由中华书局出版,译订者为陆费执和瞿桐岗。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美国盖葆耐(Brownell Gage)编写的《中国学校英语教授法》(*How to Teach English in Chinese Schools*),也使用国际音标讲解英语发音。

我国历届政府,从清末开始,重视全国性教材编审工作。教育部(委)所领导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制订英语教学大纲、统一课程标准、编辑审订课本,对英语语音教学自然也起到了规范指导的作用。从 20 年代中期到解放前夕,先后有林语堂编著的《开明英文读本》(1927)、周越然(Tseu Yih Zan)编写的《修订英语模范读本》(1929)、王云五和李泽珍编写的《初级中学用综合英语课本》(1934)、林汉达编写的《高中英语读本》(1935)及先由林语堂编写后又与伦敦大学学院语音系 H. M. Davis 夫人合作修订的《开明第三英文读本》(1933)。这些“部审”教材内容丰富,质量颇高,发行面广,使用时间约在 10 年以上。在语音教学方面注意紧随英国英语标准发音 RP 的发展趋势。周越然和王云五使用的国际音标,根据 Jones 的《英语发音词典》,林语堂(1933)和林汉达(1935)则使用《袖珍牛津英语词典》注音符号标音。但林语堂似乎对英国 Jones 语音体系更为重视,他认为:在中国进行英语发音教学,最好的办法是以国际音标宽式注音为依据,因为这是最简单、最科学的方法。(林语堂 1947:11)

除了普通英语教材,还有数本英语语音学课本介绍 RP 体系。由邵鸿馨编著、中华书局 1939 年出版的《英语发音津梁》(*A Guide to English Pronunciation for Chinese Students*)明确说明:受过教育的南英人士使用的发音,被语音学家们视为标准读音,也是英国私立寄宿中学教学发音。希望改进发音

的中国学生需要一种模仿的标准。有充分理由说明,他们应该采纳上述这种已受到肯定的标准。该书的音位体系、音标体系和音标书写方法,就其经济性和明晰性而论,与 Gimson 体系相比具有很多相似之处。

五、六十年代有三种教材,在英语语音教学方面具广泛影响;1956 年陈琳、杨树勋、王光宗编写的《大学英语课本》、1959 年葆青编写的《英语语音简明教程》和 1962 年许国璋主编的《英语》,都具有系统、简明等特点,遵循 Jones 1956 年第 4 版《英语语音》和 11 版《英语发音词典》体系,以国际音标宽式注音代替牛津音标或韦氏音标,大体规范了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英语语音教学,为巩固和发展英国英语标准发音的教学成果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总的来说,尽管 1949 年前后在我国各大中学校任教的美国人或留美教授为数不少,但以 Jones 英语标准发音 RP 理论为准绳的我国英语语音教学体系,从未受到过根本动摇。RP 一直是我国英语教学中阐述最为清楚、教材使用最广、录音资料最丰富的占主流的语音体系。

二、Gimson 普通型 RP:

英语史上前所未有的语音规范

本世纪 60 到 90 年代,是英语语音发展史上很重要的时期。在经历了 Jones 理论高峰之后,语音理论与描述跟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快速演变的英语现实之间,出现了明显脱节趋势。当 1917 年 EPD 第 1 版问世时, Jones 把他那本词典所记载的语音模式称为 Public School Pronunciation (私立寄宿学校发音,简称 PSP),从 1926 年第 3 版起改为 Received Pronunciation (RP)。Jones 当时将该语音模式定义为“有男性成员在著名私立寄宿学校受过教育的英格兰南方家庭平时交谈的常用发音”。60 年代初,Gimson 依据广泛的语音调查,修正、宽化了 Jones RP 定义,使其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和地域基础,更为

大众化,更能真实反映英语发音现状。那是1961年,Edward Arnold出版社请他根据英国国内市场需要,撰写一本发音教材。结果,他还将教授外国学生英语所用的一些材料也囊括了进去。该书名为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于1962年出版,使他在英国内外一举成功。

Gimson 在这部著作中,对英语发音标准、音位体系及音标体系作了认真而慎重的选择,在英语语音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他认为英国社会有三种 RP。一种是老年人及某些职业和社会圈子里的人传统上通用的保守型标准发音(conservative RP),属于过时的“19世纪末年流行的发音”。另一种是以 BBC 播音员为代表、流行最广的中年人使用的普通型标准发音(general RP)。第三种叫作激进型标准发音(advanced RP),这种发音的使用者主要来自某些专门性社会群体,特别是上层阶级的青年一代。其中最为夸张者,可能会给人一种“矫揉造作”的感觉,而那些并非赶时髦而产生的新式发音,则很有可能预示现代 RP 的发展方向,而成为将来的普通型标准发音。所以,他认为词典注音和英语教学,尤其是教外国人学习英语发音,应以普通型 RP 作为标准模式。

在本世纪 50 到 60 年代,Trager 和 Smith (1951)所倡导的结构主义音位学很有影响,但 Gimson 并没有为了争取注音体系的简化而倒向美国那种合乎逻辑而又简洁经济的音位分析方法。他也没有采纳 Jones 提出的不太受人欢迎的建议,如以时位理论为依据,将 *beat* 和 *bit* 两词中的元音看作同一音位,等等。关于前一种抉择,他在该书前言中解释说:“主要原因是我们需要一种语音层次上明确,音位层次上又相当整洁的音位分析。采纳传统使用的英国英语注音方法阐述语音发展及变体,似乎更加方便易行。”(Gimson, 1962) 关于后一种抉择,早在 40 年代后期他就开始酝酿了。1944 年 Jones 在

哥本哈根 *Acta Linguistica* 杂志上发表论文“Chronemes and tonemes”提出上述观点,以便简化音标体系。不久,Gimson 也在该杂志撰文,题为:“Implications of the phonemic/chronemic grouping of English vowels”,就英语标音问题介绍了他的实验过程和结果。这项实验大体上利用听写方式进行。参试者是 26 名来自伦敦及附近地区、缺乏基本语音知识的人,但熟悉 Gimson 的发音方式。听写的单词包含传统时位/音位元音对子(chronemic/phonemic pairs)/,如 /i:,i;æ,α;ɔ,α;u,ʊ;e,ʌ/。Gimson 通过改变单词的元音长度和音质来检测受试者的反映与理解程度。分析实验结果之后,他得出了结论:对于操南部英语的人,音质比音长更为重要。任何需要显示音质重要性的标音,都应将音质区别置于首位,元音音位总数要达到 20—21 个。假设以长音符号象征音质不同,不该以音长、而应以音质为基础。在纯粹的宽式音位标音中,似乎找不到什么理由反对使标音再稍微严些窄些,描写性质再明显些,甚至在正规长元音后面加注长音符号。关于这篇论文的价值,至今没有见到有人评论,但刚刚步入语音学界的青年 Gimson 是不是这时就萌发了构拟 RP 新体系的念头呢?经过 10 多年酝酿,1962 年他的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问世时,便正式推出了一个含 20 个音位的崭新元音体系:

- 7 short /i, e, æ, ɪ, , ʌ, ə/
- 5 long (relatively pure) : /i:, ʊ:, α, ɔ:, ɔ:/
- 3 long (glides to []:/e, a, ɔ/
- 2 long (glides to []:/ə, α/
- 3 long (glides to [ə]:/ə, ə, ə/

关于建构这个元音体系的理论基础,他还提供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承认当时存在着几种富于逻辑性又精确经济的元音音位标注体系。特别是 Jones 特宽式标音,可以减少 5 个音标。但 Gimson 认为音位分析要看教学对象与目的,非常经济的音位体系并不总是

最有使用价值。他的音位体系不追求最为经济的体系,但要使标音向学习者提供有关音位发音的大量知识(特别是音质与音长之间的关系),还要相当尊重操 RP 的英国人对区别性元音对子的感觉与反映。

在具体的元音音位描述中,Gimson 又以存在于音位之间的音质方面的相互关系为依据,按照基准元音(cardinal vowels)的顺序重新进行了排列,共分三行。单元音、合口双元音和中向双元音各占一行。

/i: ,e ,æ,ʌ,ɑ: ,ɔ: ,u: ,ɪ ,ə/

/e ,a ,ɔ ,ə ,ɑ /

/ə ,ə ,ə/

在辅音的命名、分类、排列、描述及教学方面,Gimson 与 Jones 相比也有不少革新之举。广泛运用语音学和音系学最新研究成果阐释自然交际中的音位变体更是该书的一大特色。Gimson 的理论体系得到了很多语言学家和词典编纂者的赞誉和效法。

1963 年 Jones 由于年事已高,把《英语发音词典》的改编更新工作托付给 Gimson 进行,于是有 1967 年 EPD 13 版的问世。¹这一版词典最主要的特色是编纂指导思想的改变。在 Gimson 心目中,EPD 主要是向把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读者介绍现代英语发音。所以他把充分满足词典当今使用者的需要和反映 RP 的目前状态作为编修 13 版词典的指导思想。既然主要读者不再是本国人,那就应注重具有区别意义的音位发音并剔除老版中许多非区别性的音品(allophonic)注音。前任主编 Jones 曾多次宣称:RP 本身并不比其他发音模式“优越”或“漂亮”,他之所以把 RP 作为词典记录的对象,是因为他恰好能够充分地、准确地取得有关这种发音的知识。他无意成为语音改革者或决定语音好坏的评判者(Jones, EPD 13 版简介)。Jones 这番话,显然是说给他的同胞听的,颇有一种不偏不倚的风度。但本世纪后半叶的英语早已成为国际通用语。为了适应

世界各地读者的需要,Gimson 大胆提出:这本词典基本上带有描述性的意图,但对多数读者来讲,也应具备规定性的功能。为了忠实反映现代 RP 的情况,圆满完成规定性功能,Gimson 从这一版开始,在尊重本世纪初叶以来 RP 定义已经淡化这个事实的前提下,改变了元音舌位图上单元音 /ʌ,ɑ,ə,ə/ 的舌位和双元音 /əu/ 的起点舌位,还就 300 个单词的读音选择及重读模式向 100 位从事语言工作并能对发音现状作出客观评价的人士发出问卷调查,然后依照统计数据修订词条,其中有 *actual*, *bankrupt*, *frontier*, *issue*, *retch* 等。Gimson 认为,编修词典不应故意超前推崇在一代人时间里还不能真正站稳脚跟,并得以普及的读音(Gimson, 1967: VII)。从整体来看,EPD 13 版仍然遵循包括音标在内的 Jones 理论体系,但 Gimson 的这种客观、求实、继承与革新兼顾的语音学思想,基本上得到了贯彻,使这本词典,甚至整个英语语音学领域,呈现出一种由 Jones 体系向 Gimson 体系过渡的趋势。这种局面是 EPD 1917 年首版以来的第一次。很多学者,如 Arnold (1965)、Bansal (1971)、Lewis (1972)、O'Connor (1973) 和 Trim (1975) 对 Gimson 体系都表示了浓厚的兴趣,竞相采用。特别是 Lewis (1972),通过描述他的 *Concise Pronouncing Dictionary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清楚地表达了他对 Gimson 体系的赞赏与理解。

10 年之后,即 1977 年,Gimson 独立承担编辑的 EPD 14 版问世。他根据英国社会与语言现状,继续宽化、更新 Jones RP 定义,对 EPD 实行了全面修订,把这本具有世界影响的词典正式纳入了他 1962 年以来所开创的理论体系。从此,以 Gimson 为代表的普通型 RP 体系在英国和世界范围内,进入一个大普及并得到最后确认的阶段。

Gimson 的理论体系得到了国际知名语音学家和音系学家的承认,他的同窗 O'Connor

nor, 几乎在语音学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与他同步。Gimson 的理论体系在 EFL 词典编纂家当中引起的反响尤为强烈, 许多家出版社竞相采用。首先是近年来英国出版的最优秀的学习词典,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1978) *Longman Dictionary of English Idioms* (1979), 继而是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1980 年修订第 3 版), 它直接邀请 Gimson 教授作语音编辑, 使其原本就已相当精简的音标体系更加科学, 为后来的学习词典树立了样板。采纳该体系的 EFL 词典还有: *An English Reader's Dictionary* (1969), *Collins English Learner's Dictionary* (1974), *Oxford Elementary English Dictionary* (1981), *Longman Active Study Dictionary of English* (1983), *Longman Dictionary of English Collocations* (1986), *Times - Chambers Junior Dictionary* (1987), *Oxford Student'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1988), *Collins COBUILD Essential English Dictionary* (1988),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1989), *Penguin English Student's Dictionary* (1991), *Longman New Junior English Dictionary* (1992), *Longman Handy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 (1993), *Collins Gem English Learner's Dictionary* (1993), *Longman Illustrated English Dictionary for Young Learners* (1996)。除 Collins 词典仍使用老式音标外, 几乎所有 EFL 词典都采纳了 Gimson 44 音位体系和新式音标体系。

面向英国国内读者的普通语文词典, 也有在 EPD 14 版发行之后很快就采纳 Gimson 体系的, 如 *Collin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79) 和 *New Collins Concise English Dictionary* (1982)。这两本词典都在突出位置登载着 Gimson 的专文《The

pronunciation of British English,》使读者对普通型 RP 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明彻的轮廓, 这可说是的 Collins 一大创举。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 Gimson 语音体系的影响, 已经从“学习者词典”和普通语文词典扩展到专业性和百科性词书, 如: David Crystal 的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1987), Wells 的 *Longman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 (1990) 及 *Oxford Encyclopedic English Dictionary* (1991) 等。

但在英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比较保守的国家, Gimson 体系能否取得最为正式的确认, 还取决于具有浓厚民族特色和广泛国际声誉的老牌正宗牛津词典的态度。

老牌正宗 Oxford 词典, 自 1911 年 Fowler 兄弟出版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COD) 以来, 从不规定发音标准, 所记录的发音包括多种类型。70 年代初, 由于普通型 RP 影响的扩大和理论上的日臻完善, 该出版社的态度也开始松动。4 卷本 *A Supplement to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EDS) 和两卷本 *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分别于 1972 和 1973 年作出规定: 本词典所注发音是英格兰南部受教育者使用的发音, 即“公认标准发音”。COD (1976) 第 6 版也接着宣称按照 RP 注音。

当 Gimson 教授于 1977 年推出 EPD14 版后, Oxford 系列词典编辑们不仅继续遵循“公认标准”和“标准发音 RP”, 还专门邀请 Gimson 参与修订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² 并且在各类词典中彻底放弃了坚持六、七十年的繁琐不堪的牛津标音法, 改用国际音标, 并标注 Gimson 普通 RP。

这是英语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它象征着英语普通型标准发音体系, 从音标到理论, 在英国本土上取得了全面的统一, 赢得了规范地位。我们在讨论英语语音教学体系改革时, 无法漠视这种差不多持续了一百

年的历史进程与现实,而应主动地、系统地进行研究与借鉴。

三、中国英语语音教学体系:目标一致、种类繁多、内容庞杂、亟待梳理

这种情况有其历史的原因。当1962年Gimson推出他的传世之作时,我们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1967年EPD 13版问世时,我国正值“文化革命”高潮,使我们五年之间错过了两次机遇,没有及时吸收英语语音学的最新成果。1977年EPD 14版后,国家开始改革开放,宽松的政治气氛和急切的社会需求,唤起了英语教师语音研究的热情。从1983年至1985年,仅三年时间,便有劳允栋(1983)、张冠林(1983)、邹世诚(1983)、周考成(1984)、许天福(1985)、方淑珍(1985)、何善芬(1985)等RP教材出版发行。当时大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参考资料,也没有相当的理论准备,难以在短期内吸收概括上述一些英语语音学的最新发展倾向,就是陈琳、葆青、许国璋这些知名专家也未能解除Jones保守体系的束缚。如果将他们改革开放前后出版的代表性教材作一番对比性研究[陈琳、杨树勋、王光宗(1956)与陈琳(1980)、葆青(1959)与葆青(1988),许国璋(1962)与许国璋(1993)],便会发现如下一些问题:

陈琳(1980):取消了早已过时的 /ɔə/ 及两个“三元音” aiə, a ə', 将元音数目简化为20个;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两对“破擦音” tr, dr, ts, dz/, 使其语音体系与中国流行的“48音素说”统一起来。

葆青(1988):从正文看,整个音位体系未作改变,音位总数仍为45个。旧有的元音舌位图,依然故我,包括改写后的 /əʊ/ 的起点。但在“英语元音音素”表内,增加了 /eiə, aiə, əʊə, aʊə, ɔiə/ ,使元音总数扩大为26个。另外,含“三元音”的例词都打了重音(见 p. 12),说明作者注音时把“三元音”视为元音系列,而不是正式音位。所以,从实质上讲,葆青仍在坚持她的45音位体系。

《新编许国璋英语》(1993):具有全新的思路、全新的内容和全新的设计,可惜在语音体系方面留有許多保守性的遗憾。

作者称:“本书采用最新国际注音音标”。我认为这是指Gimson主编的EPD 14版音标。然而该书只是采用了其中的一部分,如用 / , , ,ə ,a ,eə/ 分别取代 Jones 体系中的 /ɔ,u,ə: ,əʊ ,aʊ ,eə/ ,但拒绝接受 / / ,致使Gimson体系中的 / ,e ,a ,ɔ , ə/ 仍然写为 /i , ei ,ai ,ɔi ,iə/ 。

从第IV页上的“音标表”来分析,该书语音体系含49个音位,而不是许国璋(1962)的48音位。明显的变化包括:

(1)增加了 /eiə, ə ə, aiə, a ə, ɔiə/ 共5个三元音,并在练习中(如 p. 120)作为正式音位处理,使元音音位数目上升到25个。这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与一般音系学原理相左。

(2)取消了两对破擦音 /tr, dr, ts, dz/ ,使辅音音位减至24个,辅音标音更加音位化。

但《新编许国璋英语》正文仍然使用许国璋(1962)的语音体系,对英语各音位的文字描述和元音舌位图可以说是原封未动, Jones保守型RP的特点都像过去一样留存下来,舌位图上 /əʊ/ 的起点与葆青(1988)相同,还是从前的 [o]。在单词读音方面笔者曾作过抽查。以17课 Hong Kong 的词汇表为例,42个词语中有14个与EPD14版不同;扣除两个印刷错误,仍占三分之一。

改革开放后,国家教委推荐出版了一些新教学大纲和新教材,对我国英语专业或非专业英语教学起到了指导规范和促进作用。可是,就语音体系而言,也有不少根本性的问题值得商讨。以1989年正式出版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英语教学大纲》和1992年胡文仲等编写的《大学英语教程》为例:

1989年大纲“语音项目表”列出54个音位:

1. 元音26个,其中单元音12个,双重点元音9个(含 /ɔə/),三元音5个 (eiə, aiə,

auə,əuə,ɔiə)。

2. 辅音 28 个,其中破擦音 3 对 /tʃ,dʒ; tr,dr;ts,dz/。

这显然是一个既不属于 Jones 保守型 RP,也不属于 Gimson 普通型 RP 的语音体系,是一个过于繁杂的非音位性语音体系,难以在现代著名语音学著作和英国词典中见到。

《大学英语教程》坚持中国 60 年代以来的 48 音位说,比上述大纲的体系精简,但在音位分类与描述方面,仍可发现不少保守型 RP 的痕迹,比如,说 /r/ 是摩擦音,说 /ɑ/ 是低元音,说 /ɔi/ 是由 /ɑ/ 向 /i/ 滑动的双元音等等。

现代英语的音位体系包括这一语言的全部音位及其分类、描述、相互组合关系、词中分布和音标书写等多项内容。限于篇幅,我们不能从各个方面仔细论述国内其他教材书籍的语音体系。下面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国内使用 RP 音位数目的初步统计,也许能够帮助大家进一步认识我国英语教学中语音体系的繁杂情况。

44 音位体系使用者:教育部师范教育司(1984a)、方淑珍(1985)、陆谷孙(1989)、刘正仪(1990)。

45 音位体系使用者:郑易里(1959)、谢大任(1963)、张其春、蔡文萦(1963)、葆青(1973、1988)、教育部师范教育司(1984b)、周考成(1984、1990)、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词典编辑室(1990)、蔡文萦、赵琏等(1994)。

46 音位体系使用者:许天福(1985、1986)、张凤桐(1996)。

47 音位体系使用者:陈琳、杨树勋、王光宗(1956)。³

48 音位体系使用者:董亚芬(1961)、许国璋(1962)、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教研室(1973)、杜秉正等(1978)、陈琳(1980)、大连海运学院英语教研室(1981)、复旦大学(1982)、唐钧、王美芳(1982)、张冠林(1983)、

何善芬(1985)、胡文仲(1992)、人民教育出版社外语编辑室(1993)、许国璋(1993)。

49、50、54、55、56、57 音位体系使用者分别是:秦秀白(1983)、蔡冬生(1963)、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英语教学大纲制订组(1989)、劳允栋(1983)、邓君敏(1986)和邹世诚(1983)。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十多种教学体系使用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教授英国英语 RP,并且音系框架大体一致。规范我国英语语音教学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就在这里。

四、规范、更新、统一、简化

我国英语语音教学体系

为了尽快改变长期存在的语音教学与英语现实及理论日趋脱节的局面,许多人都在认真思考英语教学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如何规范、更新、统一、简化我国英语语音教学体系。

就我国语音学界整体而言,体系的探讨开始于研究介绍当代英国英语的发展变化开始。进入 80 年代,大家的研究兴趣集中于以 A. C. Gimson 为代表的普通型标准发音体系和他的两本具有世界影响的著作: *EPD* 和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比较重要的文章大概有 10 数篇。这些文章向读者详细介绍了英国英语标准发音 RP 在音位体系、音位发音、音位分布、重音以及语调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以及以 Gimson, O'Connor 为代表的普通型标准发音的主要特点,对我国英语教学中的语音体系问题提出了颇具远见的意见。其中许天福(1985)发出呼吁:“中国英语教学也应紧跟上 RP 的变化,不要停留在琼斯的体系上,而是应该适应吉姆森的新体系。”

普通高等学校和师范院校的英语专业,担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级英语人才和师资的繁重任务。为了实现英语语音体系转轨并进而建构我们自己的语音教学体系,许多教师都为新教材的编写付出了多年努力,如劳允栋

(1983)、张冠林(1983)、方淑珍(1985)、许天福、虞小梅、孙万彪(1985)、刘正仪(1990)、俞述翰(1991)、张凤桐(1996)等。前三种教本的观点在保守型 RP 和普通型 RP 之间,常常处于某种过渡状态。而后四种教材或论著对 Gimson 普通型 RP 体系的接受与运用,似乎比较彻底、比较全面。它们之间的一致之处远远超出了表面上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英语教学以 Gimson 体系为依据,规范、更新、统一、简化语音教学体系的大趋势。

采用 Gimson 注音体系的英语词典和英汉词典,在我国大量出版发行,既是对我国英语教学中语音体系转轨的推动,也是此项艰巨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复旦大学陆谷孙教授主编的《英汉大词典》(1989)为此作出了贡献。

五、希望与期待

一个国家在英语教学中采用什么样的发音模式,由该国英语教学的历史和现状所决定。词典和教材应当使用统一的发音标准和音位体系,这是英语学界多年来一致的见解。本文通过历史回顾说明,我国在本世纪 20 年代选定了以 Jones 为代表的英国英语标准发音作为教学发音范型。经历了 70 多年的教学实践之后, Jones 体系可以说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由于英国英语音位体系的转换已成定局,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英语教学界,不得不在英语语音教学体系方面慎重进行再一次选择。有三种可能摆在面前:

第一,对英语语音教学的标准与音位体系问题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容许各级各类学校各种教材、各种词典政出多门、各霸一方;或者继续让 Jones 体系与 Gimson 体系在我国英语教学中自由竞争,静观事变,尔后决定取舍。过去这样做,可能是受了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学术上也有某种必要。如果现在还不改变这种方针,则必然会使我国英语语音教学在理论与实践上离国际水平与英语现

实越来越远。

第二,继续坚持使用以 Jones 为代表的保守型 RP。这显然违背了英语发展规律,是一种逆语言潮流的作法。诚然,语音体系是从历史中成长起来的,是在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以 Gimson 为代表的普通型 RP,是以 Jones 为代表的保守型 RP 连绵不断的历史演进的结果,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第三,在全国英语教学中实现语音体系转轨。英语语音学界许多专家教授,在有关方面支持下,为此进行了约 20 年的理论探讨和教学实践,逐步达成了共识。概括起来就是:以 A. C. Gimson 为代表的英国英语普通型标准发音体系是以 Jones 为代表的保守型标准发音体系的延续和发展,它冲破了英国社会等级、受教育程度和地理观念的藩篱,比保守型发音具有更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而且音位体系简洁经济,最具权威性分析与描述,已得到大多数英国语音学家、词典编纂家和 BBC 等传媒的认可和赞同,也是英语世界流行最为广泛的语音体系,同时也是目前唯一能够规范、更新、统一、简化我国英语语音教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和准绳。

实现我国英语语音教学体系的转轨是一项有关我国英语教学成败的艰巨事业,几名或几十名学者难以最后完成。我们真诚地期待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会同有关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并做出切实可行的规划,以满足 21 世纪国家对英语人才的高度需求。

附注:

1. 2. 见 Gimson 先生 1985 年 2 月 4 日给笔者的信件。
3. 原书第 4 页说“在英语中元音音素和辅音音素各二十四,共四十八个”。但实际所列的单、双、三元音数目只有 23 个。

主要参考书目

Arnold, G. F. & A. C. Gimson. 1965. *English Pronunciation Practice*. Hodder and Stoughton, London.

- Bansal, R. K. 1971. *An Outline of General Phone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ge, Brownell, 1921. *How to Teach English in Chinese Schools*.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 Gimson, A. C. 1945 - 49. Implications of the Phonemic/Chronemic Grouping of English Vowels, *Acta Linguistica*, V.
- Gimson, A. C. 196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1st edn.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 Gimson, A. C. 1977. *Everyman's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 14th edn. Dent.
- Gimson, A. C. 1980.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3rd edn. Edward Arnold.
- Gimson, A. C. 1981. Pronunciation in EFL dictionaries. *Applied Linguistics*, Vol. II, No. 3,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Gimson, A. C. & S. M. Ramsaran, 1982. *An English Pronunciation Compan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D. 1940. *An Outline of English Phonetics*, 6th edition, E. P. Dutton & Co., Inc. New York.
- Jones, D. 1956. *The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4th edn. enlarged and revis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D., 1956.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 11th edn.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 Jones, D. 1960. *An Outline of English Phonetics*, 9th edn. Cambridge W. Heffer & Sons Ltd.
- Jones, D. 1963.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 12th edn.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 Jones, D. 1967.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 13th edn.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 Lewis, J. W. 1972. *A Concise Pronouncing Dictionary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Connor, J. D. 1973. *Phonetics*. Penguin.
- Trim, John. 1975. *English Pronunciation Illustrated*, 2nd edn. Cambridge.
- 葆青, 1973. 《英语语音简明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
- 葆青, 1988. 《实用英语语音》。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教研室, 1973. 《大学基础英语》第一册。商务印书馆。
- 蔡文慈、赵珺、陈作卿、麻乔志, 1994. 《最新高级英汉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 陈琳、杨树勋、王光宗, 1956. 《大学英语课本》。北京:时代出版社。
- 陈琳, 1980. 《英语》第一册(广播电视外语讲座试用教材)。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陈永培, 1983. A. C. Gimson 论英语词典的注音, 《现代外语》, 第3期。
- 大连海运学院英语教研室, 1981. 《基础英语》(修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杜秉正、赵珺、王家福、郑培蒂、沈一鸣, 1978. 《英语》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 复旦大学, 1982. 《英语》(理工科用), 第一册(第2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英语教学大纲制订组, 1989.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英语教学大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何善芬, 1985. 《实用英语语音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胡文仲等, 1992. 《大学英语教程》, 第一册(修订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教育部师范教育司, 1984a. 《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专业教学大纲》(试用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芳允栋, 1983. 《英语语音学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良佑、张日升、刘犁, 1988. 《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林汉达, 1947. 《新课程标准世界中学课本高中英语读本》。世界书局。
- 林语堂, 1933. 《初级中学学生用开明第三英文读本》。开明书店。
- 林语堂, 1947. 《初级中学学生用开明第二英文读本》, 第14版。开明书店。
- 刘正仪, 1990. 《英语语音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陆费执、瞿桐岗(译订), 1928. 《英华正音词典》(*An English - Chinese Phonetic Dictionary*), 第6版。(第1版, 1921)原著者: Daniel Jones。
- 陆谷孙(主编), 1989. 《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
- 秦秀白, 1983. 《英语简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 人民教育出版社外语编辑室, 1993. 《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英语第一册教案(下)》。人民教育出版社、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
- 唐钧、王美芳, 1982. 《初级中学英语第一册教学参考书》,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词典编辑室,1990.《现代英汉词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王云五、李泽珍,1934,《初级中学用综合英语课本》,商务印书馆。
谢大任,1963.《医学基础英语》,人民卫生出版社。
许国璋,1965,《英语》,第一册(第2版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许国璋,1993,《新编许国璋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许天福、虞小梅、孙万彪,1985,《现代英语语音学》。陕西人民出版社。
许天福,1985,从琼斯《英语发音词典》1—14版看RP发展变化的趋向,《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
许天福、孙琳,1986,《英语语音系统练习200题》。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俞述翰,1991,《英语语音学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社。
张凤桐,1996,《英国英语语音学和音系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张冠林,1983,《怎样学习英国英语的音》。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周考成,1984,《英语语音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周考成,1990,《英语语音学引论》(修订本)。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周越然(Tseu Yih Zan),1929,《修订英语模范读本》。商务印书馆。
邹世诚,1983,《实用英语语音》。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收稿日期:1997年12月15日;

修改稿,1998年7月5日;

本刊修订稿,1998年8月1日:

通讯地址:610064 四川大学外文系。

北外英语系举办语言学研讨会

新学期伊始,北外英语系语言学专业教研室于8月29日举办了学术讲座及交流,邀请了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主任徐烈炯教授和香港语言学学会主席、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助理教授石定栩博士。这次活动旨在交流和展望语言学在北外、香港和国外的研究情况并探讨双方学术合作前景。英语系语言学专业教研室主任吴一安教授主持了这次活动。

研讨会上,石定栩博士就汉语比较级的性质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徐烈炯教授则从人类语言的异同出发,旁征博引,探讨了语言的普遍性和相对性。两位学者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并对香港和国外语言学研究的动向和趋势作了介绍。

王琼琼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The phonological systems employed in China's English teaching, by *Zhang Fengtong*, p. 1

By way of an over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British general RP represented by A. C. Gimson and major studies in English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by Chinese scholars since 1978,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some critical comments on the various phonological systems employed in China's English teaching of this century. The author holds that an immediate switch-over from the Jones system to the Gimson system is now well prepared and wishes this proposal accepted soon.

The wh-movement parameter of English relative clauses — a study o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by Chinese speakers, by *Chen Yuehong*, p. 11

This paper reports the results of a study that aim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Chinese speakers with advanced English proficiency are able to reset the wh-movement parameter in their acquisition of English relative clauses. In the study, a grammaticality judgement test was conducted on Chinese, French and English speakers. Results show that Chinese speakers are not able to reset the wh-movement parameter, and thus are not clear about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relative clauses. This is due to interference from the native language and misanalysis of language input.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opic-prominent features on Chinese EFL learners' compositions, by *Cai Jinting*, p. 17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empirically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P features on Chinese EFL learner's compositions. 90 learners were examined and four points were discovered: (1)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fluences of TP features on beginning and intermediate learners, but there is between the first two groups and advanced learners. (2) The four parameters of TP have various degrees of influence on the compositions. (3) At least 23 per cent of the errors resulting from the TP features are attributed to Chinese transfer. (4)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eginning and the intermediate learners' decision on the function of Chinese transfer, but there is between the first two groups and advanced learners.

On the pragmatic transmutation of English interrogatives, by *Xu Shenghuan*, p. 27

Transmutation of interrogatives demonstrates itself in two ways: the transmutation in gramma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that in pragmatic functions. The former assumes the form of structural changes, which will finally turn interrogatives into non-interrogatives, and the latter bears the characteristic of gradual decrease, or even transference, of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This paper discusses English interrogative transmutation, and attempts a hypothesis that the transmutation is caused by the grammatical transmutation is the result of grammatic alization of pragmatic transmutation.

Beaugrande's procedural model of text and its theory, by *Cheng Qilong*, p. 35

Beaugrande's study of text is cognitive-oriented. He accepts connectionism, emphasizes the procedural approach and adopts the relational network of ATN as its main notation. His goal is to account for the procedural relation between textualities and language types. However, Beaugrande over-emphasizes the operational procedure and neglec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extual world as the base for operation. Consequently, further generalization of operation types is not without difficulty.